



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学术研究之余，一直关注大学教育。他最新研究大学的著作《大学新语》日前出版，这也是他“大学五书”的最后一本。陈平原曾统计，如果算上此前出版的有关大学的书籍，“20年间，出版大小十书，长枪短炮，纵论大学及教育”。这些书凝结了陈平原对大学精神、大学的现状与历史的思考，如他所说：“中国大学仍在路上，既非十全十美，也不是朽木不可雕，这才值得我去去追踪，去思考，去参与。”

陈平原的“大学五书”出版——

大学需要学问，更需要精神



西南联大成了当下中国大学的一面镜子

即将迎来高考季，考大学又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。在“大学五书”之一的《大学何为》一书中，陈平原曾说，“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，这也是中国特色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种关注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可见一斑：高考不用说，几乎是全民总动员，每年上演的，是同样的节目，可公众百看不厌。从试卷的押运、考场的周边环境、考试那天的气温、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，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、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，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，每年都有。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、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；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，有人唉声叹气，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、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、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；再再接下来，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、高考状元有无奖励、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。

比起公众对大学的关注，陈平原谈大学有自己的思路。在《大学新语》的序言中，陈平原说自己谈大学，大致采取三种策略：以大学为主，兼及中学；以历史为主，兼及当下；以论文为主，兼及随笔。“之所以如此锲而不舍，那是因为，我认定借梳理20世纪中国大学的历史、文化及精神，探讨何为值得追怀与实践的‘大学之道’，是个很诱

尊重学生的独立选择

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绪言里，陈平原介绍了一幅让其印象深刻的老照片，这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的合影。陈平原解释，之所以提这幅照片，是因为这张照片可以看出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值得骄傲，“联大有精神：政治情怀、社会承担、学术抱负、远大志向。联大人贫困，可人不猥琐，甚至可以说‘气宇轩昂’，他们的自信、刚毅与聪慧，全都写在脸上——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”。反观今天的大学，虽然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，都正朝“世界一流”飞奔，“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、干净与自信的合影——那是一种由内而外，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”。

前不久，去上海推介“大学五书”时，陈平原也向读者分享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在这张拍于30年前的老照片里，刚考上中山大学的陈平原和同学们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裤脚“剥落了乡下的泥土”，坐在学校的草坪上。

人的题目。”陈平原希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碰撞中，展开对于“大学之道”的深入思考，“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”。

在这些有关大学的书籍中，陈平原不时就他对大学的思考发声，比如他说“真正的北大，是看不见的北大”，以此追寻老北大所代表的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精神；在《大学何为》中，他谈论大学校长时，更是直白地表示，因为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，“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”，提醒大学校长不能是纯粹的行政官员，而应是著名学者。

在去年出版的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中，陈平原对很多有关西南联大的传说，一一认真对待，与档案资料等对照阅读，以求从中发现或阐扬现代中国的“大学精神”。多年以来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大学的样板，关于西南联大的学者故事也往往和民国范儿、学术自由等联系，但陈平原在此前受访时解释，这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理想化倾向，“将其作为当下中国大学的一面镜子”。陈平原提醒，当下中国大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，但需要仔细梳理——哪些属于制度问题，哪些属于观念问题，哪些是学者本身的缺憾，哪些又是整个时代氛围决定的，“历史是一面镜子，但不是一个标准，更不是万应药方”。

1980年代在陈平原眼里是“清风明月和浪漫无边”的，尽管也有风雨，但社会文化氛围浓厚，很多恢复工作的老教授依然保有着曾经的风骨。陈平原回忆，1982年他本科毕业后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，写了一篇学术论文，想去参加全国学术会议，于是把文章拿给导师吴宏聪看。老师看了以后，却说：你这个文章我不同意。陈平原则坚持己见并想去参会，老师让他去就行，并补充一句说：“文章写得不错，但我不同意。”

此后，陈平原考上北京大学博士，师从著名学者王瑶先生，当他与王瑶先生谈及此事时，王瑶说：“吴宏聪是西南联大出来的，西南联大就是这个样子，老师不是万能的，老师是有立场的，但认可学生的独立选择。”

这也契合陈平原在《大学何为》一书中的观点，他在书中说，大学需要“学问”，更需要“精神”，“学校办得好不好，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，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。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，有明显的精神印记”。

大学为何总成为社会热点

□陈平原

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，这也是中国特色。这种关注，最终落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。新生还没入学，“故事”已经讲了一大堆。这还只是例行公事，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。如研究生录取作弊，学术著作抄袭，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，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，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。我说“任何一个版”，是有所指的。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，现在神出鬼没，无所不在，可以是政治、科技、法律，也可以是经济、体育、娱乐。

大学成为公共话题，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，我也不例外。偶尔出境，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。喜欢谈论大学话题，以致有时被介绍为“大学史专家”。这属于“美丽的错误”。因为，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，“文学史”与“大学史”，形近而讹。我始终称，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，是amateur，“爱美的”。五四时期，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，并在国内提倡“爱美剧”，用的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。中国的教育问题，关系重大；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，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，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。实际上，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，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。

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，外在原因是：第一，百余年来，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、学术发展、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，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时至今日，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，一般人能看得很清楚。第二，由于连年扩招，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，大学的是是非非，牵涉千家万户。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，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。第三，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，他/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。第四，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，其中的佼佼者，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，但也有不少坚定的“粉丝”，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。

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：第一，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；第二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，中国大学也在转型；第三，正因为有问题，在转型，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，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。

有一个疑问，如此局面的形成——即大学经常在

媒体中露面，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？应该说，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，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、百年校庆前后，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。不过，一般情况下，关于大学的新闻，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，媒体喜欢谈论北大，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？他说，校方很少主动出击，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。别的学校我不懂，以北大的情况而言，太多的媒体关注，太多的新闻报道（包括正面与负面），不是好事情。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，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。

你到国外看看，人家的大学校园，比我们宁静多了。没有那么多喧嚣，没有那么多关爱，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。传媒关注当下，需要热闹；大学追求久远，必须冷静。各有各的趣味，走得太近，在我看来，不是好事情。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，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，即过分看重曝光率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，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，就缺能在电视上“侃”的；可能的话，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，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，不用写论文，只要每回出境时打上“某某大学教授”就行了。这也是一个思路，等于给学校打广告。

办一流大学很难，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，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，需要积累，需要冲刺，而且还不一定成功；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，就是最好的学校。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，其关注大学，自有理由；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，自己的目光与襟怀。

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，尽可见仁见智；但无法否认的是：第一，校园里的一举一动，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，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，你就可想而知。第二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，好的坏的，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，围墙早就形同虚设。第三，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订单式服务”；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，不是好主意。

（本文摘自《大学何为》一书）

【相关阅读】

“大学五书”

